

屠格涅夫爱情小说的悲剧特点

罗 岭

一八五六年屠格涅夫开始写作《贵族之家》。他拟出了大纲,写出了最初几章的草稿,但是他写得很慢,一直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到一八五八年秋天才完稿。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后,他还写作了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书信集》(一八五四年)、《浮士德》(一八五六年)、《波列谢耶之行》(一八五七年)、《阿霞》(一八五八年)、《初恋》(一八六〇年)。上述的这部长篇和几部中篇小说都是以描写爱情为主题的。

它们最突出地代表了屠格涅夫的爱情小说所具有的一贯特点,就是把爱情写成一幕悲剧。

在《僻静的角落》里,作家把爱情描写为一种对人的无限权利,这种权利是足以导致一个人的死亡的,就好象“穷苦的奴隶在不可战胜的主子的脚下死去”。屠格涅夫认为爱情这种盲目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客观规律。

在《书信集》里,在主人公阿列克赛的心目中,“爱情根本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一种疫病,它常常就象霍乱或疟疾一样,不问情由,突如其来,违反一个人的意志降临到他的身上”。“爱情里没有平等……在爱情里,一方是奴隶,一方是主子,无怪乎诗人们常常说爱情是加在一个人身上的锁链。”在小说中,阿列克赛死去了,他就是作为爱情的奴隶死去了的。

在《浮士德》里,屠格涅夫用著名的德国诗人歌德的一句话:“你应该节制”作为这部中篇小说的题词。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巴威

尔和维拉的没有结果的爱情指出个人的幸福在现实生活里是很难获得的。它是转瞬即逝的,因而人们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它。一个人应该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自己的义务。巴威尔说,幸福是“无需考虑的。它根本就不会来。……”

在《波列谢耶之行》里,屠格涅夫把爱情比作自然界的山洪。它自发地、难以想象地发生了。人在它的魔力面前,就好象在自然界难以预防的威力的面前一样,完全是没有自卫能力的。

这种把爱情作为一种人所不能支配的,不能控制的,不能管辖的自然力来描写也反映在《阿霞》里。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国外相遇的故事描写了一幕不可挽回的爱情悲剧,主人公由于一句没有及时说出的话,就使他这个本来可以非常幸福的人永远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光棍。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口谈到爱情的不可捉摸:“那时候,我在那间命定的屋子里遇见她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白地意识到我的爱情。甚至那时候,我跟她的哥哥在那种荒谬的、痛苦的沉默里坐在一块儿的时候,爱情还没有在我的身上觉醒……只有在几分钟以后,我害怕一种灾祸可能发生,我开始去找她,唤她的时候,爱情突然带着它那不可抑制的力量爆发起来了……然而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更加弥漫着这种爱情悲剧的阴影。这篇作品是以男女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恋爱故事为主要情节而展

开的。拉夫列茨基年幼丧母，在父亲的严厉教育下孤独地长大成人，使他一直到二十三岁还不懂生活也不通人事。大学一毕业他就盲目地爱上了一个庸俗的女人，并且立即结婚，和她一道去法国。接着他们的婚姻关系完全破裂了，因为在法国，他的妻子完全被巴黎纸醉金迷的生活所腐蚀了。他对爱情完全绝望了，于是回国，打算作一番事业。但是回国之后，他又爱上了一个叫丽莎的姑娘。当他从绝望中苏醒过来，向往生活的幸福，准备再婚时，他的妻子归来了，于是一切都成了泡影：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也只有心灰意冷，感到衰老无用了。他痛苦地喊道：“你好，孤独的晚年！烧尽吧，无用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屠格涅夫作品中爱情描写具有这样前后一贯的悲剧特点呢？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作品本身来进行探讨，那是得不到什么答案的。应该说，这是他本人家庭生活，也是他个人爱情生活，更进一步说是他那渐进主义的人生观的反映。

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对父母的不幸婚姻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作家在记忆里父亲永远是一副冷淡的面孔，一双沮丧的眼睛。父亲很少过问家里的事，象一个外人一样住在自己的家里，他很少欢笑过，如果有一天他偶然地对孩子们温和地笑笑，孩子们就感到好象过节日一样的高兴。屠格涅夫对此曾经是茫然不解的，后来慢慢地懂得了这一切都来自于父母亲的婚姻悲剧。屠格涅夫的父亲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骑兵团服役，担任采购员的工作。有一次为了购买马匹，他和母亲结识了。这时她已三十岁，而他只有二十四岁，他的个子又矮又肥，面貌极丑，性格凶暴，而他长得又高又大，英俊而漂亮。然而祖父却要父亲向她求婚，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贫如洗，而她却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女地主。祖父对父亲说：“看上帝的面，娶她为妻吧，否则我们就只有求乞于街头了！”

于是他们结婚了，入赘到了她的家里。

而她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完全以她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秩序，她要周围的人绝对服从，不能容忍任何人有一点独立和自主，即使是她最亲近的人，她的丈夫也不能例外。这种不自由的，不平等的，受管辖的生活使他终日郁郁寡欢。使他在正当盛年的四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父亲曾经把自己婚姻的悲剧作为人生的教训告诉过年幼的屠格涅夫：

“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但是不要求婚，要知道，你是属于你自己的。”

因此在小屠格涅夫的脑海里，婚姻不是什么幸福，而是一种辖制，一种奴役，一种锁链。父亲懊恼和沮丧的面孔就是最形象的说明。未来的作家后来把父亲的形象写在他的小说《初恋》里。

父亲的婚姻情况如此，而屠格涅夫本人的爱情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前后经历了三次恋爱，但是三次都是没有结果的，都是不幸的。一八四一年五月屠格涅夫从德国留学回到俄国，他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三年的青年。他回到母亲的庄园，认识了她一个缝纫女工阿芙多琪亚，这是一个又好看又文静的姑娘，屠格涅夫热烈地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两个青年人结合在一起了。但是母亲发现了，于是一场灭顶之灾代替了纯真的爱情之梦，她暴跳如雷地大吵大闹，接着姑娘被赶走了。她走的时候，已怀身孕。

屠格涅夫就这样埋葬了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们在《贵族之家》里看到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双亲的恋爱史就是这场恋爱的再现。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到他的好朋友巴枯宁的家乡普列穆兴作客，因而结识了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她二十七岁，是一个极有教养的姑娘，她擅长音乐，会好几门外国语，而且还很喜欢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力图用哲学来思维和探索人与人的关系。她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在屠格涅夫没有到来之前，她从哥哥巴枯宁书信介绍中

已对屠格涅夫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来了之后，他那种翩翩多姿的风度，诗人般多愁善感的气质，哲学家式滔滔不绝的锋利言辞，立刻吸引了她。她觉得，他就是她所等待的人，至于他呢？他称她为姐姐，因为她大他四岁，后来则称她为诗神，他在普列穆兴只逗留了六天。在短短六天的时间里达吉雅娜已热烈地爱上了他，她给他写了许多长篇大论的信，倾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她的兄弟姐妹都热烈地卷入了他们感情的漩涡，热情地等待着一场婚事的喜讯。但是他们这首“普列穆兴的情歌”没有能唱下去。因为屠格涅夫尊敬她，并不爱她，在他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就以“性格不合”而中止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虽然这样，达吉雅娜的情影长久地留在他的心里，常常引起他的怀念，《书信集》就是描写他和达吉雅娜的这一次恋爱。那里面有些书信就是从他和她真正的通信中摘录出来的。至于达吉雅娜的形象在他后来长篇小说中富有诗意的女主人公娜达丽亚、丽莎、叶琳娜等等画廊里都有深刻的反映。

一八四三年是屠格涅夫走上文学道路关键性的一年；也是他个人生活遇到了第三次恋爱的一年。这年秋天法国著名的歌唱家二十二岁的波里娜·维亚尔陀来彼得堡演出。她的天才表演轰动了俄罗斯的艺术界。热爱音乐的屠格涅夫几乎场场必到。他为她的歌唱入痴入醉地倾倒。他深深地爱慕她，崇拜她惊人的天才。波里娜已经结婚，屠格涅夫却对她终生依恋，直到他的晚年，从一八五四年起他长期和她的家庭在法国定居。这种插足于波里娜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生活，这种依人篱下的生活，给他带来了终生的不幸。尤其是在一八五七年他和波里娜之间发生了不和，更加使他在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变得愈来愈消沉和悲哀。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准备抛弃一切，不想活下去了。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到巴黎看到他，大大地吃惊他的巨大的变化，在日记中写道屠格涅夫

“完全变了一个人”。涅克拉索夫曾劝他要彻底地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屠格涅夫也痛苦地意识到“不能老住在别人的小巢边”。为了排遣自己不快的情绪，他常常象无根的浮萍一样到处漂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会儿到意大利的罗马，一会儿去德国的德累斯登，再一会儿又去英国的伦敦。在这四处漂泊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盲目无据的爱情和对祖国的思念结合在一起，写进中篇小说《阿霞》里：

……那草原的风的气味在一瞬间使人想起了祖国，在我的灵魂里面唤起一种强烈的乡愁。我真想呼吸一下俄罗斯的空气，在俄罗斯土地上行走。我不由高声嚷道：‘我在我里干什么呀？我为什么在异乡，在异国中间漂泊呢？’接着，我在心里所感到的那一个死一样的重块，突然崩裂为痛苦的折磨人的激动了。

这是小说主人公发自内心的呼号，也是屠格涅夫本人的呼号。

爱情对于屠格涅夫是一场又一场连绵不绝的悲剧，她和阿芙多琪亚热烈相爱，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但由于母亲的阻挠，而不能结为夫妇，他和达吉雅娜的恋爱，由于是达吉雅娜单方面的追求，也没有能发展下去，最后他爱上了波里娜·维亚尔陀。但是由于她已是一个有夫之妇，使他终生只能成为她的朋友和客人。

他从自己切身爱情生活的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人是不能获得爱情的幸福的。一八四九年他给波里娜的一封信中写道：“谁说人是注定自由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与此相反。”接着他引用了歌德的著名诗句“人并非生来就是自由的。”然后他又写道：“这根本是事实，是真理，是他作为大自然的正确观察而说出的真理，他也确是这样的观察家。”

一八五六年他给拉姆伯特伯爵夫人信中写道：

我不再指望自己的幸福了，也就是说，不再指望那种为年青的心所接受的，仍然具有忧虑意义的幸福了。

屠格涅夫对爱情的悲观、怀疑，形成了

他对爱情的“不可知论”，这和他在政治上采取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屠格涅夫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母亲那种残暴而专横地虐待农奴的行为，农奴在背后注视她的那种恼恨和忧郁的目光深深地印在他的幼小的心中，使他从小的时候就憎恨农奴制和奴役，同情被压迫被统治的农奴。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立下了和农奴制作斗争的《汉尼巴誓言》。后来他留学德国，学习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探讨俄国的社会改造事业。但是由于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他和其它贵族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俄国改造的道路只能是逐渐改良，而不是革命，即所谓“和平进步”。他把希望寄托在沙皇的身上。一八五五年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以后，为了避免革命，决定在保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逐渐地、悄悄地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当他于一八五七年宣布废除农奴制的诏书时，屠格涅夫简直欣喜若狂。当赫尔岑在《钟声》杂志对亚历山大进行批评时，屠格涅夫忍不住写信给赫尔岑：

请不要骂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这样他或许会失去勇气的。

是的，对于革命，屠格涅夫是非常畏惧的。一八六〇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前夜》，描写了一个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的形象。小说发表后，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发表了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在这篇论文里他热烈赞扬了英沙罗夫的形象，他把英沙罗夫的形象同俄国的现实相联系起来，指出俄国虽然不象保加利亚一样，遭受土耳其外部敌人的奴役，不需要民族解放的英雄，但是俄国“内部的敌人比千千万万的形态分布各处，无可捉摸，不动声色，但是却到处使你惊惶不安，毒害着你的生活”，因此更为需要俄国的英沙罗夫。显而易见，批评家在这里是在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屠格涅夫在这篇论文还没有发表时，就看到了原稿，他完全不能理解这篇论文的深

刻意义，他更不能同意杜勃洛留波夫对他的《前夜》这部长篇小说的解释，难道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说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难道他竟在号召革命？他坚决不同意，他决不能允许把他的小说理解为革命小说，他愤怒地要求《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不刊登这篇文章，涅克拉索夫没有同意。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和他有着十年友谊历史的《现代人》杂志。

屠格涅夫害怕革命，自称为“渐进派”，认为“受过教育阶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俄国唯一的进步社会力量。一八六二年，他写信给赫尔岑说：

唉，老朋友，请相信，生动的，革命的宣传的唯一支点，乃是俄国受过教育阶级的少数人。

一八六三年，沙皇反动政府第三厅截获了赫尔岑、奥加辽夫等流亡在国外的革命活动家写给他们的同志和朋友的信件，发现在这些信件中常常提到屠格涅夫的名字，因而指控屠格涅夫和赫尔岑举办的《钟声》编辑部有非法的联系，并通过法院召他回国，接受审讯。屠格涅夫以各种借口拖延回国，并亲自上书给亚历山大二世，保证自己政治上对皇上的忠心，信仰上的“温和”。并且还捐了两枚金币去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钟声》杂志就屠格涅夫这一表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玛达林（男性）（圣女玛达林是一个妓女，曾以眼泪洗耶稣的脚，并用头发把它们擦干）上书皇上，陈诉他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引用了这篇文章作为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贵族自由主义者的解释。赫尔岑用白发苍苍的圣女玛达林的形象来影射屠格涅夫显然是含有讽刺意味的，但却是中肯而确切地反映了他的精神面貌，他的政治上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

而屠格涅夫的这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渐进主义和他对爱情的观点有着密切的联

系。爱情对于个人生活就如同革命对待社会生活一样意味着巨大的变革。一个人的性格、情操、内心最隐秘的活动常常不是在平凡的小事上而是巨大变革前充分地展现出来。因此作家们常常选择爱情的主题,通过不同的人物对爱情的态度来揭示他们的心灵。屠格涅夫笔下就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人公,如《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待爱情也表现出执着而坚定的态度;相反的《罗亭》中的罗亭,则只有革命的言辞而没有革命的行动,在爱情上也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屠格涅夫通过人物形象说明了人们在对待革命和对爱情的两个方面总是表现出的性格一致性。归根结蒂,则是对待变革具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同时屠格涅夫也通过上述作品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他让英沙罗夫过早地死去,让罗亭成为爱情的逃兵又说明了他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那就是生活是不能改变的,人们只能逐渐地改良而不能急剧地、迅速地改革。屠格涅夫的家庭不幸和个人恋爱的失败形成了他在现实生活面前无能为力的悲观情绪,而贵族阶级的局限性和他政治上改良主义的立场,就又加剧了他对爱情的悲剧观点和“不可知论”的神秘

感。这两个方面互为影响,构成了他作品中爱情描写具有一贯的悲剧特点。而这恰恰是作家世界观里害怕任何根本性变革的局限性,是这种局限性在爱情题材小说里所投下的阴影。正因为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屠格涅夫对爱情描写的真实性的同时,又对他的悲剧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谈到《浮士德》、《阿霞》男女主人公时,极幽默地指出:

这些人物在无话可说,而又必须消磨闲逸的时光,用交谈和幻想来填满空虚的头脑或空虚的心灵时,是很勇敢的。但是要直截了当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时,大多数人就开始犹豫,感到舌头不灵了。

批评家尖锐地指出,这些人物的不幸,并不是什么爱情的自然力量,难以想象的魔力,而是他们作为贵族知识分子的懦弱,而是社会生活条件造成他们的这种懦弱。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屠格涅夫小说中爱情悲剧的特点归之于作者对于社会生活黑暗统治的恐惧,归之于作者世界观的软弱和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可以说是对屠格涅夫的爱情小说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也是极为深刻的批判。

(上接 90 页)

课题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为丰富目录学的研究作了一定的贡献。

郑振铎致力于书目工作由来已久。早在五十年前,他就大声疾呼编制索引的重要与必要,倡导编制专题目录和参考目录。他对新出版的目录书籍,很是关注,曾为《丛书书目汇编》、《书目长编》等作过评语。建国以后,他担任政府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对图书馆和目录事业更加关怀。如,经他的指示,文物局在北京团城承光殿及北京图书馆,举办过多次的图书展览;1956年,他在《人民日报》上以《漫步书林》这一总的标题,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图书馆学和目录学方面的短文,这

些对我国目录事业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 吴晓铃:《〈西谛题跋〉序》,载《读书》1979年第5期。

②⑤⑧ 《劫中得书记》新序。

③ 《中国文学研究》第617页。

④⑦⑨ 《劫中得书记》序。

⑥ 《劫中得书记》。

⑩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⑪ 《谈整书》,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6日。

⑫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

⑬ 《中国文学论集》第739页。

⑭ 《谈买书》,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日。